

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当代建构

李懋君

(遵义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 遵义 563002)

摘要: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 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 事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首要前提就是要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在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指导思想地位因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涌入而日益受到挑战, 其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功能和作用被削弱。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需在直面西方意识形态的挑战中争夺思想斗争的主阵地, 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努力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战斗力、感召力和影响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话语权; 建构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583(2016)-0031-05

On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Power about Marxism Ideology

LI Mao-ju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Zunyi Normal College, Zunyi 563002, China)

Abstract: Ideology is germane to CCP's future and destiny, to social security of China and to the unity of our nation, which needs the discourse power if we want to promote the ideology well.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Marxism in the guideline of our country is facing challenges from capitalism ideology and cultural values, specifically, the role or function in guiding social thought and attitudes has been weakened. In order to win the control of Marxism ideology, we must work the ideology known among the masses, striving to improve efficiency, emotional appeal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Marxism ideology.

Key words: Marxism ideology; discourse power; construction

冷战结束后, 世界历史并没有按照布热津斯基、福山等人的期冀终结于资本主义, 也没有出现像加缪、丹尼尔等人所宣称的“意识形态终结”局面。真实的情形是: 在承认社会主义持存于世的前提下, 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披着“文化”的外衣, 较之于冷战前以更隐蔽的方式向社会主义国家渗透, 亨廷顿的话——“在后冷战世界中, 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 而是文化的区别”^{[1]P7} 对此进行了贴切注释。冷战结束后, 裹挟于全球化大潮中的西方意识形态携手西方的工业产品和文化产品涌入中国, 影响中国, 改变中国, 其表征之一是“宪政民主”、“自由市场”、“普世价值”等观

念开始植根于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挑战和削弱, 部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西方代理人被培养起来。面对意识形态斗争的严峻形势,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 坚持正确导向, 提高引导能力, 壮大主流思想舆论。”^{[2]P32} 习近平在 2013 年的“8.19”讲话中谈到思想和意识形态斗争时指出: “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也没有开明绅士, 就得斗争”^[3]。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 开展意识形态斗争, 首先必须确立和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基于此, 本文以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论域, 探讨马

收稿日期: 2016-04-15

作者简介: 李懋君, 女, 贵州遵义人, 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政治思想。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问题。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大意义

广义的意识形态是指形成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思想体系,反映着人们之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渗透、体现和表达于哲学、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文化形态中,以价值观为其核心表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利益和意志的观念表达,因此,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在存有多个阶级的社会里具有多种意识形态,并且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会以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式体现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还进一步指出:“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统治阶级会竭力“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4]P550-55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表明,在多个阶级共存的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多种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并且以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名义上升为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即狭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产物,担负着表达统治阶级意志、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巩固统治阶级地位的使命。

“意识形态具有捕获人的能量和唤起、激励人们行动的价值”。^{[5]P349-350} 不同的社会阶级从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出发,都力求使自己的意识形态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思想力量,由此产生了思想领导权之争也即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所谓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指“意识形态被认可、接受和推广应用的程度,是依据自身地位,拥有控制、引导或规范社会生活,以致足以为社会立言的权力”。^[6] 意识形态话语权主要包括四种权力:一是提问权,即基于特定的阶级立场对现时代的重大任务和重大问题进行发现和追问,表达本阶级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二是论断权,即对时代的重大问题进行判断和回答,为本阶级制定政策和采取行动提供思想依据;三是解释权,即为开展政治动员进行理论阐释、政策说明和政治宣传,推动阶级主张社会化;四是批判权,即对本阶级以外的错误思潮进行批判,对敌对意识形态进行斗争,为本阶级的政策主张和政治行动进行合法性辩

护。^[7] 只要阶级矛盾存在,开展意识形态斗争进而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斗争就不会停止,资本主义社会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亦如此,而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则更甚。那种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已然终结,因而主张淡化意识形态甚至“去意识形态化”的思想,不过是别有用心者的恶意谋划和理想主义者一厢情愿的梦呓。苏东社会主义在和平演变战略下的灰飞烟灭,一些中亚、东欧、北非政权在“颜色革命”中的轰然垮台,以及当前我国在“普世价值”围攻下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逐渐萎缩,无不以经验的事实表明,资本主义世界发动的意识形态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这种意识形态战在冷战结束前主要以丑化和妖魔化共产主义为基本手法,冷战结束后则主要是兜售资本主义“药方”,前者旨在摧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后者着眼于确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权,这是葛兰西“阵地战”理论在西方的当代运用。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工作问题上只提领导权和管理权,随着近年来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中国催生出异质化的思想场和舆论场,中国共产党开始体认到确立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性,并开始把话语权与领导权、管理权并提。习近平在“8.19”讲话中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3] 不言而喻,要实现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和管理,就必须构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而习近平所讲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即是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解读“8.19”讲话精神可知,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意义可以用习近平所说的“三关”来概括:第一,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立党立国的基本指导思想,离开马克思主义,放弃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就会蜕化变质,沦为没有理想信仰的政治集团,从而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并丧失政权。前苏共在其执政后期经历了一个从淡化马克思主义到放弃马克思主义,以民主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蜕变过程,最终导致在西方意识形态攻讦下节节败退,对整个苏联社会风起云涌的各种政治思潮失控、失权、失语,这从反面说明了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性。第二,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国家安全维系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内

部的稳定,即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群体能认可和接受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意识形态格局,主导性政治意识形态能够确立,主导性价值观能够生成;二是国家外部的挑战,即异质性政治思潮、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从思想层面带来的冲击能被国内主流意识形态所消解。在当代中国,只有确立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才能有效引领国内各种社会思潮发展,有效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第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主要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制度、物质条件、社会生活等的认可程度,而社会成员又通常是“在意识形态中,通过意识形态并依赖意识形态体验他们的行动”,^{[8]P265}因此,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形成与多数社会成员是否具备共同的思想基础直接关联。在当代中国,这一共同的思想基础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及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可和接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这又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

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相伴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不断丰富,表达方式和传播手段也更为多样,其引领社会思潮的地位尚且得以保持。但是近年来,出现于我国社会的各种思潮呈不断滋蔓之势,意识形态领域多种“话语”的对话与交锋日趋激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日渐受到挑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乃至遮蔽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遭遇如是处境,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和文化话语霸权的侵蚀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其一,意识形态的进攻。冷战结束后,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方向重点转向中国,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政治上极力宣扬所谓的“宪政民主”,把社会主义中国污蔑为专制暴政;经济上鼓吹“完全自由市场”,企图瓦解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思想文化上兜售“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竭力贬低马克思主义;外交上惯常在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上设置“议题”,攻击社会主义中国践踏人权。西方开展的意识形态进攻战在我国社会中产生了一定影响,诱发了国内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其二,文化话语霸权的侵蚀。西方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历史地形成了对于世界事务的话语权,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大的文化生产力,则借助这种话语权对非西方世界输出文化和价值观念,并在世界多样性文明的交流与交锋中形成了文化话语霸权。从当前中国学术界一部分人“言必称希腊”、“文必引西方”,以及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学术流派和学术思潮的狂热追捧,可以看出西方文化对中国学人的深刻影响,更不用说大量涌入的其他消费性文化产品如影视节目对中国普通民众思想意识的影响。其三,信息霸权和信息战。“当今国际互联网上80%以上的网上信息和95%以上的服务信息由美国提供。在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入和输出流量中,美国所占的比例都超过了85%,互联网上90%的信息是英文。”^[9]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凭借其巨大的信息技术优势,把全媒体时代的互联网打造成“西方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的终端工具”,成为其向社会主义中国推销意识形态的平台;同时通过互联网向中国受众捏造事实,散布谣言,颠倒是非,甚至进行政治暗示和鼓动,培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亲西方势力,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话题域和舆论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辩难、攻讦和否定。

第二,国内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削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力。如前所述,受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我国出现了某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和人物,这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起着消解作用。除此之外,市场经济条件下催生的各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加大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难度。其一,多样化价值观产生的解构作用。市场经济在释放社会活力的同时,不仅促发了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也催生了大量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消极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主流意识形态所标举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等遭遇冲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影响力渐趋减弱,其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功能日趋消减。其二,随着我国市民社会的逐渐发育成型,受工具理性影响的价值选择愈发个性化、原子化、务实化,人们开始摆脱从众心理,根据现实的利害关系和自我价值标准来决定意识形态取向,个人的出身、经历、职业、处境等成为取舍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因素,功利主义成了取舍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则,马克思

主义意识形态的官方性质难为原子化和功利主义化的个体所接受。其三,转型时期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分配不公等制度性和体制性问题,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民生问题,贪污腐败、处事不公、执法不力等政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民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度及其执政权的合法性,作为党和国家根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其说服力和感召力也因此被削弱,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乘机获得滋生的土壤。

第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其一,官僚化学术体制窒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实际状况是,除少数严肃认真、真正致力于理论研究和创新的学者外,多数研究者把自己的研究仅仅定位和停留于政治宣传、重复口号、歌功颂德的层面上,空洞无物、无病呻吟乃至低俗反胃的八股文章大行其道,这导致理论创新严重不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在于其解释力,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观照现实,直面问题,探求答案,而多数研究者选择回避现实,不敢承担起在批判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使命,致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一种自说自话的书斋式活动。可以说,官僚化学术体制的存在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时代问题的解释力,从而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确立。其二,思想理论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能否确立最终取决于社会成员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度,而这种接受度与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的效果紧密关联。当前,一些地方的宣传部门在实际工作中仅仅满足于形式主义的宣传,存在多个严重影响宣传效果的“不”:不关心宣传教育的针对性、时效性和实效性,不愿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不善于运用现代化的宣传技术手段,不懂得现代化的思想教育方法,不擅长于运用群众化的宣传语言,等等。^[10]总之,思想宣传和教育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从而增加了话语权确立的难度。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确立,不仅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真理性,即它的科学性、解释力和说服力,也取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

值性,即它的阶级立场、价值取向以及由此获得的合法性,同时也与它在思想文化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具体表现如主动性、战斗力、有效性等直接关联。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可以从意识形态自身建设、意识形态社会化、意识形态斗争三个维度展开。

第一,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话语体系的自身建设。首先,确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4]P9}这里实际上讲的是理论对于群众的说服力源自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因此,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首先要着力实现作为意识形态核心内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具有普遍真理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上。由此,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照社会现实,推进理论创新,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保有为时代“立言”的科学性与阐释权。其次,确保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现实向度。十七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11]P12}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价值旨归是面向群众、服务群众。因此,构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不能耽迷于形而上学的理论创造中,而是要观照社会现实,对时代课题和人民群众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并探索和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使马克思主义始终置身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场域中。这是确保意识形态话语具有生命力与感召力、防止意识形态话语游离于社会实践之外的不二途径。再次,要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时代感与亲和力。无论是过去意识形态宣传中的“革命性”、“运动性”、“鼓动性”话语样式,还是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佶屈聱牙、晦涩难懂的“后现代”学术话语,皆非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范式,因为前者已为时代所扬弃,后者则与人民大众相疏离。从话语表达角度看,主流意识形态要赢得话语权,须将威权、命令式话语转换为平等、协商式话语,将高度理论化抽象化话语转换为实践性大众性话语,要根据社会实践创制新的话语如“以人为本”,要合理吸收反映人类文明进步成果的外来话语如“市民社会”,要根

据群众实践提炼具有生活气息的话语如“正能量”，等等。

第二，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社会化。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确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掌握群众”，也即实现意识形态的社会化。在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介入大众精神领地的形式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其中人际传播是基础，组织传播是主要形式，大众传播则以新的形式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12]优化传播媒介、丰富传播手段、增强传播效度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嵌进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因此，推进意识形态社会化，首先要善于打造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传播平台，发挥党报党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品牌优势，同时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的传播优势开展意识形态宣教活动。其次，要积极探索建立宣传与反馈双向互动的传播沟通机制。与传统的单向“灌输”不同，现代传媒下的信息传播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循环式传播，即信息受众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动地搜寻、甄别、筛选、输送和反馈信息。这一方面使得传播者能较好地了解信息的作用效度，同时也为传播者改进传播内容、修正传播方式提供了依据。建立双向型传播沟通机制，可以在职业宣传工作者的主导下邀请专家学者与信息受众进行双向互动，了解受众心声，解答受众疑问，拉近传播者与受众的心理距离，从而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性，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再次，要强化协同意识，善于借用各种社会力量、社会资源助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意识形态的社会化仅靠职业宣传部门的孤军奋战是不够的，要善于发挥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体育界等各种职业性社会组织和团体的聚合功能进行宣教，善于利用社会名流、公众人物的名人效应、榜样力量传播主流价值观，构筑一方主导多方协同的意识形态宣教格局。

第三，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主动打赢意识形态斗争仗。“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13]³²⁷列宁的话表明，要确立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打赢意识形态斗争仗。基于此，应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职业宣传部门和主流媒体除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教活动外，还要大力加强红色文化资源建设，搭建红色文化传播平台，拓宽红色文化传播渠道，最大限度地为意识形态开辟根据地。同时，还要加强对现代传媒的监管，净化舆

论环境，尽力排除西方意识形态和各种错误思潮对人民大众的影响；要制定关于网络社区、新闻跟帖、微博、博客、微信等新媒介传播信息的法律法规，惩处恶意损害党和国家声誉、煽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二是主动迎接西方意识形态和国内外各种错误思潮发起的挑战，打赢意识形态斗争仗。对于西方意识形态和国内外各种错误思潮，要从政治上揭露其虚伪性，从学理上揭露其谬误性，从实践上揭露其危害性，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澄清模糊认识，划清是非界限，提高对错误思潮的鉴别力和免疫力；同时，还要在斗争中着力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高扬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彰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 [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01).
-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 [6]葛彦东.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1):74.
- [7]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2):5.
- [8](美)弗洛姆.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 [9]聂筱渝.西方的控制操纵与中国的突围破局[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3):73.
- [10]张骥,中文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我国思想宣传领域面临的挑战与实现方式探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1):165.
- [1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12]朱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日常生活向度[J].理论探索,2013,(6):17.
- [13]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魏登云)